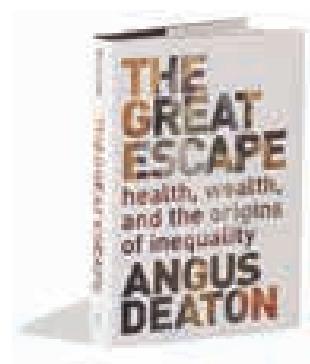


# 协助及教唆



安格斯·狄顿

## 大逃亡

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现象的起源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3年，360页，29.95美元（精装）。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格斯·狄顿（Angus Deaton）的这本书讲述了从史前时期到现代社会美国和世界各国在健康和物质财富方面的发展史。其用词典雅，涉猎广泛，内容引人入胜。

“大逃亡”这三个字从字面上来说指的是脱离贫穷和疾病，地球上一小撮人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大部分人正在实现这一目标，还有极少一部分不幸的人尚未开始这一进程。阅读本书就像经历一次人人都可参与的美妙旅行，旅程中可以倾听国际权威专家解读全球健康和收入数据。此外，对这些数据中包含的假设、偏见以及缺陷的讨论同样会为您带来美妙的阅读体验。本书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可以视作是对我们的警告：所有的经济、健康数据都难免有不完美的地方以及诸多不确定性，不能过于相信。

发出警告之余，狄顿还在书中简要介绍了全球发展的历史、所处的程度以及促成发展的主要原因。更重要地是，他在书中指出摆脱贫高死亡率和摆脱贫穷两者之间的关系

微乎其微。在西方国家，私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健康状况改善的主要原因。相反，公共服务的完善，例如水的供应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才是健康状况改善最直接的原因。如果问过去50年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增长速度更快的国家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也是最快的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作者或许应该修改一下本书的书名，因为“大逃亡”这三个字会让人以为仅仅只是一次逃亡。

狄顿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国家以控制全球人口为名，犯下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罪恶。而这又让人关注到另一场逃亡：各个国家都已经逃脱了前工业革命时代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不再和收入下降以及健康状况恶化联系在一起。

如果回头看看狄顿关于我们认知界限的论述，那些想要通过简单的政策方针来促进一国（这些国家处于全球争端中错误的一方）收入增长，或全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士可能要大失所望。书中，狄顿谈到了寻求“增长的秘诀”（也可以说是经济萧条的秘诀）这一行为的愚蠢之处。他说，这些行为试图“依靠巧合来对事情进行错误的概括。这种伎俩伊特努里亚和罗马地区的巫师拿一堆鸡杂碎作法也能办到”。狄顿还认为，为精英量身定做的机构“不利于增长”。这也是促使本书关注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方面，《大逃亡》这本书却给出了详尽的政策建议：减少援助预算。狄顿说，补助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大方的补助实际上还会“阻碍进步”。它会腐蚀政府机构，让统治者在无须征得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便可进行统治，因为他们不用对公民征税。但是，他也支持某些形式的补助，及提供该补助的方式：比如为新技术开发（包括药物开发）提供资金支持。他还指出，“外部补助挽救了贫穷国家数以百万计的

生命”，尤其是降低了儿童因传染病而死亡的数量。但是，即便是补助，由于其无助于建立基本的医疗体系，在健康方面的作用仍然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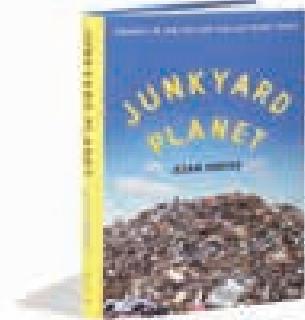
想要论证补助在总体上对贫穷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着实不易。狄顿认为，世上还有其他更加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能够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包括移民、贸易自由化、补贴改革等等。许多，甚至有可能绝大多数的补助，都在过去白白浪费了。

但是与此同时，目前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补助带来了负面影响。IMF工作人员最近的研究（IMF工作论文12/186）指出，在政府执政水平低下的贫穷国家，补助和税收是一比一的替代关系。但是对于普通的补助接收国而言，1美元额外的补贴仅仅能将政府征收的税款减少9美分。有证据显示，即便是在管理不力、依靠补助为生的国家，补助有时也能帮助建立基本的医疗体系。2004—2010年，阿富汗居民的人均寿命从42岁提高到了62岁。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资助，阿富汗卫生部管理的一个救济项目。该项目为90%的阿富汗人提供了基本的医疗服务。

各类补助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许多国家覆盖诸多领域的补助项目也都取得了成功。尽管仍有不少项目遭遇了失败，但是这恰恰是改革补助体系的理由，而不应该成为削减补助的借口。这些改革，连同移民数量的增加和贸易公平的改善，能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赤贫和疾病，这一点已经在狄顿的研究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地说明。

查尔斯·肯尼  
(Charles Kenny)  
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作家，著有：《越来越好：为什么全球发展能够取得成功以及我们如何让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好》

# 回收让未来更精彩



亚当·敏特

## 垃圾星球

行走在价值10亿美元的垃圾贸易之间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纽约, 2013年,  
304页, 27.50美元(精装)。

我们都知道, 在恐怖电影里被吸血鬼咬过的人也会变成吸血鬼。亚当·敏特(Adam Minter)的这部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环境污染会把无辜市民变成制造污染的人。在这部关于垃圾的游记中, 作者考察了全球的垃圾产业。他造访了中国文安。文安是中国塑料废品回收产业的中心, 来自中国, 乃至美国、欧洲的塑料废品都在此回收。废品回收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 因为回收的过程会产生有毒物质。中风、高血压等疾病在这里比比皆是, 居民人均寿命普遍较低。

文安人还记得, 过去他们这里曾是一片满目青翠的乐土, 桃树和清澈的小溪远近闻名。但是后来缺乏监管的石油产业带来了工业污染, 破坏了原本纯净的溪水和土壤, 农民从此再也无法种植农作物, 文安人只能靠处理垃圾废物为生。敏特在书中提到, 文安可能是他所造访的地方中污染最为严重的一处。而大部分的垃圾废物来自于他的祖国——美国。

敏特的父亲是明尼苏达州的一

名废品经销商, 敏特本人则是一名记者, 目前驻扎在上海。他本人对垃圾场很有好感, 对他目前这份报道垃圾处理的工作也非常满意。尽管有人更乐意保护熊和鲸鱼, 敏特却坚称垃圾场也是地球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然而, 本书并没有刻意渲染环境污染的可怕, 也没有落入吹嘘环保生意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俗套。它是对废品回收产业一次深思熟虑的审视, 一方面, 它强调回收产业很重要, 能够吸引有创新意识的创业家进入这个行业; 另一方面, 它也指出回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污染和破坏。

材料回收可以节能。比如说, 铝这种材料如果从矿石中提取会非常耗费能源, 但是如果从废品中回收的话, 所需要的能源就少得多。敏特同时指出, 采矿往往涉及到居民的重新安置和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但他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即把废物从欧美运到中国一定意味着对后者的剥削, 这可能是本书颇受争议的地方。敏特认为, 中国公司回收废物的积极性很高, 因为废物回收为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提供了原材料。尽管有文安等地方的例子在先, 但是监管和回收技术的改善正在逐渐减少这一行业所带来的破坏。

不过, 虽然对于在旅途和采访中遇到的各类废品回收商, 敏特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感。他却也坦言垃圾回收并非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我们把易拉罐放进回收箱, 可能会觉得自己很高尚, 但是敏特却说, 我们只不过把废品回收外包给了其他人而已。更糟糕的是, 敏特引用科学研究说明, 回收会让我们比以前更加浪费。)

再利用比再回收要好, 一开始就不使用则最好。虽然本书可能会被解读为对市场的热情赞颂, 但是它对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却持批评态度。每当一名企业家进入废品回收行业, 都意味着有一件产品被人弃置, 而这些产品一开始是不应当

被扔掉的。不过, 这么做却对产品的制造商有利。敏特在作品中强烈建议制造商延长科技产品的使用寿命, 并且使其适于改装, 而不是最后扔掉了事。如果我们想要显著减少对环境的整体损害, 最好这么做。

亚当·敏特让我们想起了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丽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她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女性(见《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中对她的采访)。她研究了所谓的“公地悲剧”, 发现公地非但没有陷入悲剧, 反而常常在当地居民处得到了精心地保护。埃丽诺不相信环境末日这类假设性的模型, 相反, 她专门研究了

但他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即把废物从欧美运到中国一定意味着对后者的剥削, 这可能是本书颇受争议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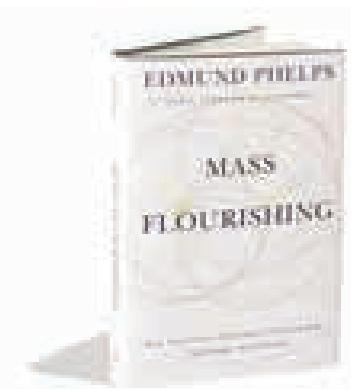
人们解决生态问题的创意方法。敏特虽然不是研究人员, 但是却有着和奥斯特罗姆类似的视角, 他询问人们具体的操作方法, 提倡实践出真知, 反对先入为主的观念, 并且指出越是简明的方法, 越能轻易解决问题。

《垃圾星球》这本书读起来引人入胜, 让人爱不释手。微言大义, 更像是小说, 而非枯燥无味的大部头。焚烧和填埋绝非是解决我们扔垃圾恶习的长久之道, 但是回收也并非像其表面上看上去那样, 永远都是环保的选择。

德里克·沃尔  
(Derek Wall)

英格兰和威尔士绿党国际协调专员、  
作家, 著有《埃丽诺·奥斯特罗姆可  
持续经济学》

# 对现代经济的几点古典建议



埃德蒙·费尔普斯

## 大众的繁荣

草根创新如何创造就业、带来挑战和变革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3年，392页，29.95美元（精装）。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这部作品是专门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创作的。它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宣言。本书的篇幅不长，但是提出了很多新颖大胆的观点。作者的文字时而鼓舞人心，时而又愤世嫉俗、咄咄逼人。作者热情赞颂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观念和思想原理，也非常赞同他对于现代经济的看法，即现代经济制度的终极目标应当是 *eudaimonia*（希腊语）。这一概念常常被翻译为“幸福”，但是不少当代作者却认为，*eudaimonia* 指的是一种程度更高的繁荣。本书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生机论。生机论能够驱动创新，而创新在费尔普斯看来恰恰是现代经济的基石。

费尔普斯认为，20世纪初的欧洲和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美国，都是日益猖獗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受害者。社团主义这一概念由费尔普斯首创，指的是公共部门日益膨胀、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项目增多、强大的工会、有实力的雇主和大公司同流

合污这一社会现象。结果，官僚主义出现了，而创新则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重视。作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偏激地认为美国已经遇到了和当前希腊同样的问题。

和本书内容最接近的一本书可能是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那本基调阴郁的作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年出版）。和熊彼得的书一样，《大众的繁荣》很难在传统的政治领域下找到其分类。这本书既不同情左翼分子支持建设福利国家的观点，也不认同传统价值观。在费尔普斯眼中，传统价值观似乎就是一些崇古的、没有商业价值的观念，比如利他主义。在其中某一个章节，费尔普斯试图用实证的方法说明为什么传统社会工作满意度较低。他认为，传统价值观的持续存在是发达经济体中所存在的危险社团主义倾向的根源。

书中各个章节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的创新能力进行了阐述。对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过去两百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石——敢于冒险。另一章则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团主义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尤其是工作满意度）。还有一章从哲学或理论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与传统主义进行了比较。

费尔普斯认为，传统主义的支持者害怕变革和危机，并且在政府和国际组织中比例过大。作者一度反对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推行所谓的“平衡增长”。他告诫 IMF 不必担心全球失衡，或者一心想着预防危机。否则的话，就说明“IMF 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转良好的基本原理”。

费尔普斯在书中集中讨论了文化，还讨论了如何通过衡量文化来解释经济增长。但是，他也看到了差距：“现代思想”起源于1500年，但是“现代经济”却是在拿破仑战争后才出现的。他认为，只有采用全新的视角，即多数人都勇于冒险，勇于创新（而不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创业家），才

能带来现代经济的增长。

书中，费尔普斯对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比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1776年不可能理解技术发展带来的可能性）、德国传统经济学（过于强调制度的作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对禁欲和储蓄更感兴趣，而不重视“试验、探索和未知能力”）、熊彼得（他重视英勇的创业家，但是沿用了德国传统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及乔尔·莫克（Joel Mokyr，他过分强调科学的作用以及工业革命的起源）。和现代经济学史学家的看法一致，费尔普斯也认为1800年之前的世界大体上进入了停滞状态，收入没有显著增长。但是奇怪的是，他在书中却只字未提当今世界对于1800年之后变革最为通行的解释，即从自然资源中获取的能源取代了人力和畜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化石燃料。

在书的最后，费尔普斯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却令人振奋。它包含了多元的价值体系。有的人可能将现代主义思潮作为生活方式（该思潮应当包含再分配的观点，以保证结果公平）。有的人则更倾向于传统主义观点（即在家庭或社区上投入更多）。后者不应当从任何再分配正义的观点中获益。对于那些想要追求被费尔普斯认为是非亚里士多德幸福生活观的人来说，再分配原则应当将其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可再分配的社会剩余的生产过程中，不是合作的一方”）。再分配原则的基石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社会公平理论。两种思潮非比寻常的目标差异旨在说明传统仍然可以为当今世界所容纳。但是这种差异却和这本书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不太吻合，即对熊彼得现代经济自我毁灭动态这一观点的革新。

哈罗德·詹姆斯

( Harold James )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